

我国青年优先发展主流化进程中的青年发展型省份： 理论范式与概念理解

朱峰¹,卫甜甜²

(1. 中央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 100081;2. 浙江省团校,浙江 杭州 310012)

摘要:在青年发展规划纵深实施和青年发展型城市(县域)创建进程中,作为中间环节的省域治理的承启功能和普遍意义越发凸显,省域不仅是国家青年优先发展主流化向市县传导的中介,其本身也是青年发展政策创新的发生层级,是国家宏观青年政策顶层设计的来源。浙江、山东、贵州、广西、河北、四川、江西、广东、海南等省份先后提出青年发展型省份及相关政策概念,并开展了省域治理现代化模式、双目标驱动模式、全域覆盖模式、源流汇聚模式、多层次联动模式、国家战略驱动模式等差异化模式的实践探索。要厘清青年发展型省份概念,须在回应本体指向、名实分离、省青关系、城市加总等定义方法的基础上,从主流化论、建构论、实体论等多种理论视角加以深入辨析。其具体论题涉及省级层面的青年优先发展政策注意力竞争、省级政府角色类型谱系、省域青年规模结构与省际青年流动等。更好发挥省域治理特色和省级政府优势,是进一步推动青年优先发展主流化进程,实现中国青年发展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青年优先发展;主流化;政策创新扩散;省域治理;青年发展型省份

中图分类号:D43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9303(2023)01-0014-15

中国式现代化治理体系必然要回应人口规模庞大这样一个现实国情问题。对于采取单一制国家结构的中国而言,治理层级问题与治理幅度问题共同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治理体系无法绕开的一个重要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国家治

理、省域治理、市域(县域)治理,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治理体系的三个层级。其中,省域是不同区位特征和发展水平的市域集合体,省域治理既要向下因地制宜承担起对顶层设计的制度再生产功能,也要向上负责传递市域范围治理绩效,

收稿日期:2023-01-0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际比较视野下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22STA047);河北青少年发展研究课题重点项目“河北省创建青年发展型城市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范式研究”(2022HBQN01)

作者简介:朱峰(1983—),男,山东济宁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政治学博士,浙江省青年发展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教授,研究方向:公共政策与青年发展、代际政治与民族政治。

卫甜甜(1983—),女,山西运城人,浙江省团校党委委员、副校长,副研究员,研究方向:青年发展理论、青年社会学。

承担改革的区域试点建设和经验推广任务,是连接宏观层面的顶层设计、战略部署与微观层面的基层创新、技术创新之间的中介环节。笔者通过对中国青年优先发展主流化进程中,介于宏观层面的青年发展规划纵深实施和微观层面的青年发展型城市(县域)广泛创建之间的中观层面的青年发展型省份构建,及其相关的青年人口政治、省域治理、省级政府角色谱系和运行机制等理论问题的审思,尝试基于主流化论、政策建构论、实体论等视角,从现象、治理、知识、事实等逻辑向度,回应部分省份提出的构建青年发展型省份的概念及其基本理论问题。

一、主流化论视野中的 青年发展型省份： 省域治理与议程生成

(一) 青年优先发展主流化进程中的省域治理

进入新时代以来的十年,终将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十年,这对于当代中国青年发展、中国青年政策、中国青年研究而言同样是意义非凡的十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问题必须引起战略关注”的指示和“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的要求,使得青年发展政策在诸多政策议题竞争中获得了“戴帽竞争”的优势和机遇,并在主流化进程中逐步实现了从国家意志转化为政策体系。《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新时代中国青年白皮书》《关于青年发展型城市实施试点工作的意见》《青年优先发展国际倡议》等系列专项性青年政策文件和青年政策倡导的先后发布,深刻推动了我国青年优先发展主流化进程。

其中,公共政策视野中的青年优先发展主流化进程是指青年发展政策不再从属于其他公共政策,逐渐成为公共政策的决策层、执行层、监察

层、评估层关注的焦点,并在形式上实现了专项化,进而获得社会公众广泛承认的过程。而主流化是一个多元利益相关主体持续深度互动的结果,在策略上包括法律、政策、结构与制度,在分析维度上包括理念、目标、策略、路径、社会支持网络等,涵盖了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上下互动等多种路径。主流化关乎注意力政治,是青年发展在注意力竞争与合作中脱颖而出,获得注意力资源,进而获得主流价值偏好,在财政资金及社会资源配置中获得优先权的过程。

据统计,到2019年10月,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已出台了省级青年发展规划,并建立了省级青年发展规划联席会议制度,展现出压力体制和注意力政治在推动青年优先发展主流化和青年发展政策传导中的“高效率”。但相较于与国家安全、国家竞争力、国家战略等宏大政治议题紧密关联,日益获得关注的宏观青年政策,微观青年政策在地方层面的边缘化境遇在一定范围与程度上仍客观存在。因此,推动青年优先发展主流化进程,无疑构成了国家首轮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实施的重要政策目标,同时也构成了青年发展型省份建构的合理性基础。为了在青年优先发展主流化视域下让青年发展型省份构建获得可测度性,我们将主流化这一概念操作化为若干观察指标(详见表1)。

第一,明确提出创建青年发展型省份或相关政策概念。“概念是自由的原则,是独立存在着的实体性的力量”^[1]。明确的政治概念或政策概念关乎主流化政治和注意力政治,是推动青年优先发展主流化、体系化、具象化、现代化的实在性力量,进而将“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的要求从抽象理念落进治理结构,以在省级党代会(全会)报告或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写入省级青年发展规划、在省级青年工作联席会议上提出、印发专门政策文件、召开新闻发

布会等形式作为测度指标。

第二,将创建青年发展型省份及相关概念作为政治承诺写入省级党代会(全会、常委会)报告。这可以视为青年发展型省份作为显性政治议题进入政治议程。从实操角度看,创建(建成)青年发展型省份(区域、城市群)、全域推进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创建青年发展型城市、支持开展青年发展型城市相关试点工作等提法均可视为进入省级政治议程(下同)。

第三,将促进青年发展或创建青年发展型省份作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写入省级政府工作报告。这标志着青年发展型省份作为明确的公共政策议题进入政策议程,有助于实现与政府各项职能衔接。

第四,出台省级中长期或“十四五”青年发展规划,并将青年发展有关内容以专章专节专栏等方式列入省级“十四五”总体规划。这有助于测度青年发展规划与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其他专项规划的衔接程度。

第五,在“十三五”及之前编制综合性、专项性青年发展规划。这代表着一个省份青年发展政策的整体性、协同性、系统性、连贯性程度,这是考量青年发展型省份建设的重要历史维度。

第六,建立省级党委政府青年工作协调议事机构。形式包括建立青年工作厅际联席会议、青年工作委员会、青年发展规划实施联席会议、青少年发展协调委员会等各类跨部门、综合性、常态化的工作协调机制。

第七,推动或组织青年发展型省份的学术研究和知识生产,促进青年发展进入学术议程,优化创建青年发展省份的学理支撑。具体以出版本省青年发展蓝皮书、出台本省青年发展指标体系作为具体测度指标。

第八,开展青年发展宣传推广。包括通过网站、官微、省级日报、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公开发布青年发展规划文本内容,在青年发展相关的网

站、微博、微信公众号开设专题栏目,引导全社会开展青年发展型省份及相关议题大讨论,推动青年发展进入全省舆论议程或社会议程,推动青年优先发展理念为社会各界广泛知晓、理解和认同。

第九,明确提出探索省域治理模式、实现省域治理现代化等有利于创建青年发展型省份的省域总体战略蓝图,以是否提出省域治理现代化目标作为测度指标。省域治理现代化是一种以省域为空间范围,以省级及以下层级政府为治理主体,以省内公共事务为治理对象,以提升专业化、法制化和智能化水平为治理目标,以体系建构、制度创新和条件保障为重点内容的治理行动及过程总和^[2]。从系统论视角看,以青年优先发展主流化、青年发展治理现代化为目标的青年发展型省份构建,也是省域治理现代化总体性系统的子系统,受到总系统的势能牵引及其他子系统的协同联动效应影响。

第十,省级青年优先发展协调预算人均规模及动态增长情况。具体以该省省级青年优先发展协调预算全省青年人均金额及其增长幅度排名作为测算指标。考虑到青年发展涉及多个党委政府职能领域,青年发展预算涵盖但不限于青年教育预算、青年体育预算、青年健康预算、青年就业预算、青年创新创业预算、青年住房保障预算、青年福利与社会保障预算、青年文化服务预算、未成年人保护预算、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算、青年工作预算,同时鉴于共青团被赋予了在推动青年优先发展主流化进程中“协调督促”的功能和使命,因此,笔者将省级共青团(含省级团委本级及下属事业单位)年度部门预算界定为青年优先发展协调预算。

此外,出台青年发展地方性法规和青年发展政策数量,推动青年发展重大工程项目进入省民生实事项目,将青年发展纳入省级综合性或专题性督导、督查、督察、巡查、巡察、巡视、绩效考核、评估等评价体系也是重要考察因素,但鉴于数据

可获得性等原因,本研究暂未将这几项指标 纳入。

表1 主流化视角下青年发展型省份分析维度

序号	观察指标	省份名单	
1	明确提出创建青年发展型省份或相关政策概念	浙江、贵州、山东、河北、广西、广东、海南、四川、江西等	
2	将创建青年发展型省份及相关概念作为政治承诺写入省级党代会(全会)报告	浙江、山东、四川、广东、江苏等	
3	将创建青年发展型省份及相关概念作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写入省级政府工作报告	贵州、宁夏、山东、江西等	
4	出台省级中长期或“十四五”青年发展规划	所有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已出台中长期或“十四五”青年发展规划	
5	将青年发展及相关内容以专章专节专栏方式写入“十四五”总体规划	河北、内蒙古、黑龙江、江苏、福建、江西、河南、广西、海南等	
6	“十三五”及之前编制有综合性、专项性青年发展规划	浙江(“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江苏(“十一五”)、山西(“十二五”“十三五”)、江西(“十三五”)、河南(2009—2013年)、湖南(“十三五”)	
7	建立省级党委政府的青年工作协调议事机构	所有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已建立	
8	推动或组织青年发展型省份的学术研究和知识生产	浙江、陕西、吉林、河北、江西、山东、贵州、广东、江苏等	
9	公开青年发展规划全文	官方网站(官微)	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安徽、福建、山东、河南、四川、云南、甘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等
		省级日报	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福建、江西、河南、海南、四川、贵州、云南、甘肃、青海、新疆等
		新闻发布会	山西、内蒙古、浙江、江西、广西、四川、青海、宁夏等
		微博专栏	江苏、安徽、四川、甘肃等
10	设置青年发展新媒体专栏	微信公众号专栏	山东、广东、内蒙古、吉林、黑龙江、江苏、吉林、贵州、福建、云南、青海、浙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等
		提出探索省域治理模式或实现省域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蓝图	浙江、江苏、湖北等
10	省级青年优先发展协调预算人均规模及动态增长情况	2020 年人均额度排名领先	西部计划服务省份:西藏、青海、贵州、海南、甘肃、新疆、内蒙古、宁夏等 其他省份:山东、广东、福建等
		2023 年人均额度排名领先	西部计划服务省份:西藏、青海、甘肃、江西、新疆、宁夏、海南、内蒙古等 其他省份:福建、浙江、山东等
		2023 年较 2020 年正增长	西部计划服务省份:西藏、甘肃、江西、宁夏、黑龙江、新疆、广西、云南、内蒙古、海南、安徽、辽宁、河北、吉林、湖南等 其他省份:福建、江苏、浙江、广东等

(二) 青年发展型省份概念的正式政策建构

在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向省级再向市县级纵深推进过程中,浙江、山东、贵州、河北、广西、

四川等省份先后提出了创建青年发展型省份的发展愿景,使得青年发展型省份相关表述作为显性政策概念进入省域治理政策话语体系。如,海

南提出了建设青年友好自贸港,广东提出了建设“青春湾区”粤港澳青年发展型大湾区的发展目标。这两个省份结合本省承担的重大区域发展战略任务来定义特色化的青年发展型省份框架^①。政策创新带来的注意力资源和政治资源构成了各省围绕基本遵循和特色省情进行政策概念建构的重要动力机制。内在的产业结构、动能转换、社会治理等现实需求构成了政策概念建构的核心拉力机制。2022年4月21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的《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白皮书》发布大会上,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傅振邦指出:17个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开展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试点的意见》之所以能够出台,也得益于“部分城市先行探索的总结提升”。“近年来,在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实施过程中,深圳、成都、济南、宁波、苏州、洛阳等90多个城市提出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山东、贵州、浙江等省份提出建设青年发展型省份,这些地方的探索和实践,为我们在全国层面部署这项工作奠定了基础”,这就进一步使得青年发展型省份作为一个政策概念在国家青年发展治理政策话语中得以确认。也就是说,尽管各部委联合开展的青年发展规划实施试点和青年发展型城市(县域)试点等“政策试点与溯因学习”模式主要局限于城市和县域,但在国家规划出台前少量省域层级自发开展的以及国家规划出台后更多省域自觉开展的“创新探索与归纳学习”,为国家层面顶层设计优化提供了经验。

1. 省域治理现代化模式:浙江。该模式以整体治理和系统治理为理论基础,注重将建设(建成)青年发展型省份作为子系统纳入省域治理现代化总系统。2018年,浙江省委省政府印发的《浙江省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7—2025年)》

在全国率先明确提出青年发展型省份建设愿景。浙江要打造的青年发展型省份的理念是“青年与浙江共发展,浙江对青年发展更友好、更关爱,青年对浙江发展更担当、更有为,这是一场‘双向奔赴’,互为贡献者和受益者”,在推进“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行”大场景下,打造“青年品质生活首选地、青年精神文明新高地、青年创业生态最优地、青年权益保障样板地、青年助力共富先行地”,推动青年高质量发展与省域高质量发展有机融合、良性互动^[3]。2022年6月,浙江十五次党代会报告提出“加快建设青年发展型省份”的愿景。2022年12月,浙江省委十五届二次全会进一步提出了到2035年“高水平建成青年发展型省份”的目标。

2. 双目标驱动模式:贵州。该模式以人学理论和人类成长理论为理论基础,因应贵州产业亟待转型、流动人口回流但人才总量不足的实际,将目标定位于青年“友好”和青年“成长”双维,通过青年提升素质、成长成才,进而服务贵州围绕“四新”主攻“四化”。2020年,贵州省“在全国率先提出建设‘青年友好型成长型省份’”,即围绕“让贵州对青年更友好,青年对贵州更有为,青年在贵州更好成长”的目标,“持续深化青年思想政治引领,围绕建设和提供更好的创新创业舞台、成长成才空间、发展发力机会、融入融合环境、配套配合政策,加快建设青年友好型成长型省份,深入开展试点示范工作,促进青年优先全面发展”^[4]。贵州青年友好型成长型省份不仅关注城市青年,也关注农村青年、乡镇青年;不仅对青年“友好”,还要有利于青年“成长”^[5]。为此,贵州省将“争取更加全面、准确掌握贵州青年发展的急难愁盼,把握贵州青年工作的基本面,从

^①部分直辖市、副省级城市也提出了创建青年发展型城市或青年友好型城市的愿景和目标,例如上海市第十二次党代会明确提出要“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打造年轻人的希望之城”,但由于其治理的规律和特点更符合市域治理的逻辑,因此,我们将这些省级城市纳入青年发展型城市的学术讨论,本文有关青年发展型省份的讨论不再将其纳入。

而将贵州抓好青年工作的比较优势,转化为实现‘友好’‘有为’‘成长’目标的具体路径”。贵州建设“青年友好型成长型”省份,就是要践行“闯新路”的历史使命,努力蹚出一条“不同于东部,有别于西部其他省份的青年发展新路”。2022年1月20日,在贵州省十三届人大五次会议上,“要建设青年友好型成长型省份,培育凝聚更多青年人才”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3. 全域覆盖模式:山东。该模式以市域治理为理论基础,注重激发市县党委政府主体性,是市县试验探索赋能赋权的一种路径。对于人口规模庞大的山东而言,这有利于扩大政策落地的覆盖面。2021年10月,山东省“在全国率先启动全省域青年发展友好型城市建设”。“全省域青年发展友好型城市建设”指向的内容主要是“聚焦就业质量、双创活力、住房保障、宜居环境等青年最关注的10个方面发力,促进城市对青年更友好、青年在城市更有为,以此为统揽推动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纵深实施,探索出一条有山东特色的实践路径”。2022年和2023年,山东省将“增强人口集聚能力,全域推进青年发展友好型城市建设”分别写入山东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和山东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

4. 源流汇聚模式:河北。该模式以政策源流论为理论基础,注重稳中求进,积累汇聚政治、政策、试点、知识、公意等多源流建构本质化的青年发展型省份体系、机制、环境,赋予其“实”,再水到渠成适时正式开启政策之窗,赋予其“名”,这是一种适合作为首都政治护城河的河北省的政策模式。河北省于2021年10月组织开展了“建设青年发展友好型省份”大讨论,聚焦“河北省建设青年发展友好型省份的必要性、可操作性、路径研究、具体举措、优势、问题及对策、评价标准、远景目标”等关键问题听取智库专家和社会各界意见。2022年5月,河北的22个省直部门

联合印发意见,全省域启动建设青年发展友好型城市的探索和实践。随后,河北创建青年发展型城市的探索迅速向市县扩散。在基本完成了青年发展型省份体系建构之后,2023年2月,河北省常委会(扩大)会议明确提出“认真实施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着力建设青年友好型省份”。可见,学术研究和基层探索成为将“青年友好型省份”推进正式政治议程的重要洪流。

5. 多层次联动模式:广西。该模式以多层次治理为理论基础,注重从省域、市域(县域)、社区多层次分层分类施策推动政策目标实现,且有助于实现层级联动。2022年11月,广西提出了构建青年发展友好型区域的目标,并印发《关于建设青年发展友好型区域的若干措施》,明确其为“广西出台的第一部全面系统聚焦青年发展的政策性文件,是全国率先以若干措施形式推出的建设青年发展友好型省域的系统政策集成”。广西对于青年发展友好型区域的定义包含了“让广西对青年更友好、让青年在广西更有为、让广西和青年联系更紧密”三部分,既注重对青年的“输入性”帮扶,也突出青年的“输出性”贡献,还强调对青年发展工作机制的深化改革,这一概念包括了“关系”和“环境”两个方面^[6]。基于此,广西“整体推进建设青年发展友好型区域,支持经济基础较好、青年人口比例较高的设区市率先整体建设青年发展友好型城市,具备合适条件的县(市、区)建设青年发展友好型县域,其他暂不具备连片建设条件的设区市从建设青年发展友好型社区起步,发挥示范作用,逐步建设青年发展友好型广西,努力在新发展阶段,走出一条符合边疆民族地区促进青年发展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6. 国家战略驱动模式:广东、海南。该模式以试验治理和注意力政治为理论基础,注重借势大湾区、自贸区等重大国家战略,建设差异化、特色化的青年发展型省份并赋予其全国意义。

2021年底,广东结合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家战略,提出了“打造‘青春湾区’粤港澳青年发展型大湾区,示范带动‘活力广东’青年发展型省份”的建设目标及16条配套举措。这一定位意味着广东青年发展型省份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促进港澳青年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使命。海南则提出了“青年发展友好型自贸港”的发展愿景。这一愿景被定义为以省级青年发展规划为统揽打造青年发展友好自贸港,推动青年发展型城市(县域)国家试点率先探索,做优做强“中国(海南自贸港)青年筑梦大道”青少年动员引领服务平台,用心用情培养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四个维度。同时,海南启动了《海南青年发展友好自贸港规划》编制工作,以激励青年在海南自由贸易港高质量、高标准建设,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培育“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事业中唱主角、挑大梁。

此外,2022年11月29日,四川省委十二届二次全会也首次提出建设“青年发展型省份”,越来越多的省份开始在省级层面以建设青年发展型省份来更新青年发展主流化模式。

二、政策建构论视野下的青年发展型省份:层级逻辑与角色类型

(一)青年发展型省份政策建构中的层级逻辑

从关系性角度审视青年发展型省份的政策建构,有两个最重要的关系。一个是不同层级政府关系,包括中央政府与省级政府关系、省级政府与市县关系、省级政府之间关系、市县之间关系。省本身就是中国“中央、省、市县、

乡镇街”四级治理层级的一个重要层级,省级政府属于最高层级地方政府。因此,青年发展型省份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从层级关系之中加以界定的,是从青年发展型国家向青年发展型城市过渡的关键层级。另一个是青年与环境的关系,包括青年与省域产业、治理、生态的关系。省域是当前青年流动的主要地理范围^①,所以青年发展型省份要关注并回应青年流动性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城乡间、城市间青年发展的整体性治理问题。现有关于省级政府层级特征的讨论,主要关注省级政府在中央政府宏观政策顶层设计和市县政府微观政策落地实施之间角色扮演的差异性,并由此引出两个关键学术问题:一是区分省级政府差异性角色扮演的评判维度及标准,二是省级政府差异性角色扮演的类型化理论模型建构。

通常,更高层级政府对青年工作的注意力水平更高。在低层级政府工作中,青年工作相较而言更为“边缘”。这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不同层级政府的事权、财权和责任分工分化,即在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提供中存在的层级职责分工,也就是功能性分权体制。中央政府对于国家战略安全负有主要责任,并需要对国家中长期发展全局进行规划,青年工作往往被置于战略安全和国家竞争力提升的角度加以审视,财政投入的外溢效应明显,属于全局性、长周期的政府事项。地方政府尤其是低层级地方政府,则面临具体的经济社会管理和群众现实诉求等诸多现实难题和紧迫压力,受制于精力资源约束和考核评价约束,因此对于被建构为“具体工作”“实际工作”的招商引资、产业发展、安全稳定、风险化解、基层治理、疫情防控等即时性工作倾注了更多精

^①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七号)》,2020年,全国流动人口375816759人。其中,跨省流动人口124837153人,约占流动人口总数的33.22%;省内流动人口250979606人,约占流动人口总数的66.78%。

力。而基层青年工作往往被建构为“务虚工作”“抽象工作”，长期以来在由强势部门掌握话语权力所形成的职能差序秩序中，青年工作通常被视为“次要工作”而不是“优先工作”，“边缘工作”而不是“中心工作”。这种观念和认知也会自我客观化为青年工作所处的无所不在的泛存在结构和环境，限制了青年工作获得财政预算，而预算规模和结构又直接决定了政府履行职能的范围和边界。青年工作的属性特点决定了基础性青年成长保障和福利服务主要还是在微观层面的市县和社区层面落地。高层级政府直接面向青年提供公共服务受到幅度有限性、空间可及性的制约，往往陷入效率与公平的悖论困境。例如省级政府直接开设运营的青少年活动场所，往往只能直接造福精英青年、特殊青年或省会青少年，而无法直接促成全省青少年公共服务提升。青少年活动场所更优化的提供方式应在县域、乡镇（街道）、村（社区）层面。省级政府如果要履行积极角色，其更合意的功能在于通过议程设置、政策工具和观念塑造（例如制定地方法规、编制发展规划，加强政策倡导、社会倡导），建立完善青少年设施场所需要的政策体系和工作体系。

从这个意义上讲，省级作为承上启下的关键层级，上接天线，下接地气，中央政策通过省级向市县和基层传导，而市县和基层政策试验创新通过省级进入顶层设计和国家战略。在青年发展规划实施中，对于省级的事权职能定位，2020年6月印发的《共青团服务青年发展重点领域和重点群体工作指引》明确提出“清晰界定各层级工作职责”，并要求省级团委将工作重点放在“推动省级青年发展规划与地方五年规划相衔接；推动县级以上党委和政府普遍建立并有效运转青年工作联席会议机制；协调出台地方性青年政策；总结推广基层典型经验和示范项目；为地市和县级团委开展青少年服务工作营造氛围、搭建平台、提供保障”等工作上面。2021年5月发布

的《关于扩大〈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实施县级试点工作的通知》要求省级团委“加强对试点地区的指导，优化工作环境，督促落实责任，推动完善机制，制定配套措施，确保试点目标任务如期实现，有条件的可以同步开展省内试点工作”。可见，省级团委在青年发展事务方面具有独特的权力、资源，包括青年发展数智化基础设施供给能力，青少年群体和青少年政策研究和传播能力，协助地市党委协管地市团委的协管权力等。这些使得其不仅可以协调横向的党政部门，还可以向市县层级传达青年发展政策和青年发展型城市（县域）创建等任务，并协调助力市县推动相关任务实施落地，从省级事权和层级关系方面界定了青年发展型省份的基本逻辑。

一般认为，中央政府向省级及以下政府推动政策扩散的机制通常有行政指令、经济激励、政治激励等类型。不同于市县试点工作来自中央、省级的指令式、竞争式试验安排，省域开展青年发展型省份政策试验最初多为自发性试验，其动力来自内部驱动。但青年发展规划纵深实施开启之后，中央尽管没有组织面向省级层次的试点，但通过交流平台、发言机会、业绩通报、表彰通报、机会倾斜、省级共青团工作考核、省级团委青年发展规划实施绩效评价等机会、方式进行注意力调试，释放反馈机制、形成扩散网络。例如，共青团中央在部署青年发展型城市（县域）试点申报工作的过程中，明确要求：青年发展型城市名额每个省份1个，对于有一半及以上设区市已明确提出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的省份，可增加1个名额。青年发展型县域原则上每个省3个名额，名额分配不搞地区间简单平衡，工作基础较好的地区可增加1—2个名额。从实际入选名单可以看出，青年发展型城市试点，浙江、广东、山东等省份均有3个城市入选，河北、江苏、江西、四川、贵州均有2个城市入选。青年发展型县域，浙江、广东、江苏、湖北均有6个县域入选，河

北、山东、河南、贵州均有5个县域入选。这些获得政策倾斜的省份或明确提出了青年发展型省份愿景,或为青年人口大省,或青年发展工作基础较好。《中国青年团》2022年第14期专刊中,介绍经验的五个省份(包括河北、山东、广东、四川、贵州)均提出青年发展型省份目标,刊载的40个经验案例来自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中,提出青年发展型省份概念的省份全部有案例入选,且入选数量排在前列,分别为广东(5篇)、浙江(4篇)、河北(4篇)、山东(4篇)、四川(4篇)、贵州(3篇)、广西(1篇)。一方面,这折射出优化青年发展型省份建设的整体性设计在促进基层创新中优势突出;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央政府部门对地方试验成效显著的省份会给予政策激励。

(二) 青年发展型省份省级政府角色类型

从政策系统逻辑和结构逻辑角度看,判断一个省份是否为青年发展型省份,可以从四重维度逻辑的九个指标加以研判,涉及层级间、领域间、区域间、城市间、城乡间、“人—事”间等青年发展关键关系。基于上述青年发展型省份概念界定及其构成要素逻辑审视,再进一步关注各省省级政府在青年发展规划纵深实施中的角色扮演和功能发挥状况,我们可以将关系性治理视角下的青年发展型省份划分为如下类型谱系(见表2)。

表2 目前提出青年发展型省份愿景省份的探索模式

项目	青年发展型省份
设计逻辑	四川、青海、内蒙古、新疆、浙江、山东、山西、湖南等
幅度逻辑	山东、河北、浙江、广东、贵州、广西、四川、江西、福建等
青年发展规划实施省级试点	河北、山西、浙江、福建、广东、四川、贵州、云南、西藏、甘肃等
试验逻辑	青年发展型城市(县域)省级试点
	河北、黑龙江、江苏、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海南、云南、西藏、青海、宁夏、新疆等

类型一:信息传递转包者。传递转包者角色是指在弱行政指令压力下,省级层面未对中央政策进行适省化的系统转译和精准设计,直接将中央政策打包或基本参照中央规划出台文件转发给市县政府。国家规划提出“各地要以本规划为指导,根据实际编制本地区青年发展规划”,随着任务分解后产生的考评压力、来自其他省份的竞争压力以及省级政府在实践中增强了政策模仿或学习能力逐渐增强,这一类型逐步在实践中消失了。当然,为了便于掌握各省级青年发展规划出台时省级政府的决策类型,我们将这一角色和政策转译设计者角色放在一起讨论,即中央政策经过省级或直接传递转包,或经过转译设计到达市县。

类型二:政策转译设计者。结合国家青年发展政策体系并根据本省实际,设计特色发展领域。作为中国特色治理工具的发展规划,其能体现出国家对经济社会发展宏观调控的国家意志和国家能力。发展规划体系具体可以分为三级三类,三级即国家级规划、省级规划、市县级规划,三类即总体规划、专项规划和区域规划。由党委政府印发的青年发展规划无疑属于专项规划中的综合性专项规划。目前,我国青年发展规划体系也呈现出三级三类的格局,三级分别是作为国家级规划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级、市县级规划。三类主要包括综合性青年发展专项规划、领域性青年发展专项规划以及共青团部门(或青年工作)规划。省级是国家层面宏观青年战略向中观青年政策,再向微观青年发展设施项目服务转化的关键层级。因为国家层面规划的宏观性、抽象性、指导性特征非常明显,市县层级规划的具象性、针对性、操作性更强,作为中间层级的省级政府就有必要通过中观层面的省域青年政策,将国家宏观青年政策转换为更具实操性的市县微观青年政策。这一角色主要体现的设计逻辑为

对中央政策纵深推进进行适省化的转化,以省级青年发展规划是否结合本省实际设计符合省情的特色领域作为测度指标。

类型三:政策压力传导者。省级政府完成共青团中央提出的出台省级规划和建立联席会议机制等规定性动作之后,将政策举措转化为实际项目,开展试点工作以及向市县纵深推进等压力随之而来。省级政府部门运用强行政指令性政策工具推动青年发展规划实施或青年发展型城市纵深推进过程中,省级政府的政策压力传导者角色便形成了。这一角色主要通过幅度逻辑展开,即除了青年工作联席会议协调机制等必选动作之外,将青年发展型城市(县域)建设、青年发展规划编制等关键工作在设区市和县(市、区)层面是否全域覆盖作为测度指标。考虑到部分省份这些工作的覆盖是一个动态化的过程,因此可以考虑将市县任一层级中实现了50%以上相对多数覆盖的省份视为实现全域覆盖,覆盖50%以下或只推动本省国家试点的省份均视为部分覆盖。

类型四:政治支持提供者。通过政策性支持、示范性支持、协商性支持、试点性支持、交流性支持、传播性支持、学术性支持、评价性支持、督导性支持等非直接财政支持工具,为市、县创建青年发展型城市(县域)提供支持和指导。政治性支持主要包括在省域内高位推动青年发展型城市(县域)创建的相关专项政策出台,以及推动其进入高层级领导注意力视域或党委政府文件。示范性支持是运用政策工具为市县提供可资参考的政策文本、实践范式、工作参照或流程参考,便于市县青年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争取市县党政支持和各部门理解。协商性支持是指省级政府部门通过写信、拜访、会谈、喜报等方式,与市县党委政府及其领导人沟通交流、交换意见、协商推进、争取支持。试点性支持是指通过国家级、省级青年发展规划实施试点或青年发

展型城市(县域)试点给予政策倾斜、经验推广、项目落地等支持的做法。传播性支持是指在各类资政报告、主流媒体中宣传展示市县青年发展业绩成果。评价性支持是指通过青年发展综合评价排名、青年发展型城市(县域)或试点城市(县域)评价排名、将青年发展型城市(县域)创建或试点纳入共青团工作考核评价等方式,为表现突出的市县及其青年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提供支持的做法。专业性支持是指通过协调专业智库、专业协会、专家学者等专业性力量,整合调查研究成果等专业性资源对市县层级给予支持的做法。如河北省率先并累计开展了三轮青年发展规划实施省级试点(青年发展友好型城市省级试点),探索采用了“省级学会+试点县区”的工作模式,为试点县区指派青年研究专家作为研究顾问,并根据基层需要协助试点县区建立青年发展智库或青年发展专家委员会,在青年发展综合性调查中扩大地市层级的样本数量,在《河北青年发展蓝皮书》研发过程中扩大实现层级样本数量及代表性,直接为地市级单位提供研究数据和研究报告。河北县域经济体量大多弱于发达省区县域,青年发展资源受限,因此来自省级政府组织动员的专业支持对于基层尤其县域是宝贵的稀缺资源。浙江省开展了青年发展规划实施省级试点工作,并率先研发了覆盖省、市、县三级的青年发展综合指数,据此开展了青年发展型城市(县域)的评价工作,并从综合指数总体表现以及发展环境、生活品质、人文素养、职业发展、权益保障、社会参与、人口态势等七个一级维度对全省设区市和县(市、区)进行了分类评价。政治支持提供者的角色主要体现为层级逻辑和试验逻辑:是否对地市和县区给予了支持,给予了什么样的支持。具体以是否组织开展了青年发展规划实施、青年发展型城市(县域)省级试点工作为测度指标。

类型五:服务提供合作者。通过转移支付、

合作提供、项目落地支持等方式直接提供资金性或物质性资源支持。分税制实行后,政策试点的直接财政性支持减少了,因此,来自青年发展型相关试点的直接财政性支持相对较少,资金性支持更多通过项目合作、经费共筹、协助对接投资

方等方式实现。如肃宁县(全国青年发展试点县城)人民政府联合共青团河北省委开展河北省青年电商直播大赛,双方分别提供相应的资源和保障,助力肃宁打造京津冀青年电商创业先锋城市和中国北方直播电商产业中心。

表3 青年发展型省份政策扩散效果

省份	覆盖效果		
	提出青年发展型城市	将青年发展写入党代会报告、政府工作报告	其他覆盖方式
浙江	11个设区市和72个县(市、区)明确提出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或县域目标		11个设区市、61个县(市、区)出台青年发展规划
河北	11个地市党委、政府先后提出青年发展友好型城市建设,实现地市全覆盖,带动82个县(市、区)同步跟进	所有地市及125个县(市、区)将青年发展工作写入地方党代会报告或政府工作报告	省市县三级青年发展作为专章专节列入“十四五”总体规划实现省域全覆盖
山东		16个地市、102个县(市、区)将青年发展友好型城市建设写入同级党代会报告或政府工作报告。	开展山东省青年发展友好型城市试点,选取全省30%的县(市、区)共计44个县(市、区)先行先试,试点县域覆盖全省16个地市
广东	12个地市,以及15个区县已先后提出了开展“青年发展型(友好型)城市(区县)”建设	21个地市全部将青年发展相关内容纳入市党代会报告	
贵州		6个市(州)、23个县(市、区)将建设“青年友好型成长型省份(城市)”写入党代会报告或政府工作报告	92.7%的市、县党委政府将规划工作纳入党建或高质量考核
四川	16个市(州)以党委、政府名义提出建设青年发展型(友好型)城市		37个试点县开展青年发展规划实施试点
江西		7个设区市、42个县(市、区)通过党代会报告、政府工作报告等形式提出创建青年发展型城市	推动青年发展规划有关内容纳入11个市级、29个县级党校主体班次培训课程
湖南			青年发展型城市省级试点在全省14个市州全面铺开,并选取30个左右县(市、区)同步推进
西藏			7个市地各有1个县区列为首批自治区级青年发展规划试点。每个地市三分之一以上的县区参与自治区级青年发展型城市(县域)试点
福建		9个设区市、平潭综合实验区已将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实现了全覆盖	

这些类型非常显著地存在于一个连续性光谱的不同位置,且在实践中并非静止的,而是存在显著流变性的,即在纵向的中央向省级、市县级持续的政策创新传导和横向的省际青年政策创新扩散推动下,提出政策概念和完善政策体系都得以持续推进,并不断从谱系弱光段向强光段演化。处于不同角色谱系位置的省份,其政策传导效果也存在一定差异性(见表3)。省级政府在中央政府部门推动的政策创新进入市县政治议程、政策议程的过程中,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省级政府对中央政府部门下达的各项政策,会从问题重要性、全省推广实施可能性及前期政策基础等方面进行判断。相较于其他政策,青年政策具有更鲜明的未来向度,短期收益激励不足。因此,政策传递施压、政策转译设计、政治性支持、资金性支持等强行政指令,比弱行政指令更有利于促进政策目标达成,促成政策层层扩散。

除了需要关注上述政治精英建构的青年发展型省份概念,还必须坚持以青年为中心的青年政策价值取向,从回应青年期待、满足青年有感的青年本体视角审视这一概念。

三、青年实体论视野下的 青年发展型省份： 空间分布与流动态势

实体论的青年发展型省份注重以结构性事实为尺度审视青年本体分布和空间流动取向的特征,注重用客观化、可测度的事实来界定一个省份是否能够被定义为青年发展型省份,并评

价其发展阶段和发展程度。一个省份对于青年及青年发展的友好程度(情感吸引力、价值凝聚力、群体承载力、赋权参与力、赋能创造力、赋值贡献力)需要客观化为形而下的结构。青年在不同省份所受到的环境塑造,以及价值分配上的激励或排斥,都会在客观的事实和数据层面有所体现。实体论的青年发展型省份可以通过三种方法测量^①。

第一,基于该省青年人口净流入(出)指标及其变化的测度方法。通过该省省外流入青年人口数与该省流出省外青年人口数的差值,判断该省份在截面时点的青年人口净流入规模。用青年净流入数量与该省青年常住人口的比值可以测算出净流入(出)率。本文将存在青年人口净流入,即能够吸引、凝聚流动青年的省份认定为青年发展型省份。从动态和趋势角度看,将2020年与2010年两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进行比较,人口净流入率上升或人口净流入规模扩大的省份也可以被认定为青年发展型省份^②。2020年,在全国各省份中,广东、浙江、江苏、新疆、福建、辽宁、海南、宁夏、西藏等省份人口净流入绝对规模最大,广东、浙江、新疆、西藏、江苏、海南、福建、宁夏、辽宁等省份人口净流入率最高。从2020年与2010年的数据对比中发现,新疆、西藏、浙江、海南、广东、湖北、宁夏、江苏等省的人口净流入率增长幅度最高,广东、浙江、江苏、新疆、湖北、山东、海南、辽宁、宁夏、西藏、江西等省的人口净流入规模增长最大。

第二,基于该省青年常住人口占该省常住人口的比例及其变化情况测度的方法。从截面数据看,可以通过青年常住人口占该省常住人口的

^①当然,青年是一个流变性的社会群体,今日之青年将成为明日之中年,今日之少年将成为明日之青年,“没有人永远18岁,但永远有人18岁”,少年儿童人口结构情况无疑也是一个省份未来青年人口储备的可资参考指标之一。因此,除了这三个方法之外,当前0—14岁少年儿童人口数量及比例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反映一个省份的人口出生率趋势和老龄化程度,从而预判一个省份未来青年人口储备规模和比例。

^②基于数据可获得性的考虑,此处使用总体流动人口数据,而非青年流动人口数据,下同。

比例来判断一个省的人口年轻化程度。这一比例高于全国青年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例的省份,可以被认定为青年发展型省份。从动态和趋势看,将2020年与2010年两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进行比较,青年常住人口占该省常住人口比例提升的省份可被认定为青年发展型省份。2020年,西藏、广东、新疆、海南、宁夏、青海、云南、浙江、贵州、陕西、山西、福建等省份青年常住人口比例高于全国水平。受到人口出生率下降的影响,相较于2010年,2020年全国所有省份均出现了青年人口比例下降的情况。其中,贵州、四川、安徽、浙江、宁夏、青海、新疆、河南、西藏、云南、湖南等省份青年人口比例下降幅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第三,基于青年常住人口占全国青年总人口的比例指标及其变化的测度方法。从截面时点看,可以测算一个省份青年常住人口占全国青年总人口的比例。比例靠前的省份,青年人口绝对数量规模庞大,可以被认定为青年发展型省份。广东在青年发展政策宣传中经常提及一个事实——每十个中国青年中就有一个广东青年,这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进行测度的。也可以基于相对规模比较视角,测量一个省份青年常住人口占全国青年总人口的比例与一个省份常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的差值。差值为正的省份,意味着该省青年常住人口相对规模高于该省常住人口相对规模,可以被视为青年发展型省份。从动态和趋势看,可以测度2020年与2010年青年常住人口占全国青年总人口比例的变化,这一比例提高的省份可被视为青年发展型省份。2020年,占全国青年总人口4%以上的省份共有9个,可以被认定为青年人口大省,分别为广东、河南、山东、江苏、四川、河北、浙江、湖南、安徽。2020年,各省青年人口占全国青年总人口比例高于常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例的省份共12个,分别为广东、浙江、云南、新疆、贵州、陕西、海

南、西藏、山西、宁夏、福建、青海。将2020年与2021年的数据进行对比发现,全省青年常住人口占全国青年总人口比例上升的省份有广东、浙江、贵州、四川、新疆、安徽、河南、海南、宁夏、西藏、江苏、青海。

随着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道路的持续推进,除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之外的其他城市落户逐步放开,县城建设提质升级工程实施带来公共服务优化和集聚力、承载力提升。东部产业结构升级迭代,部分行业企业转移布局西部,带给西部大量就业岗位。过去青年个体城市化的趋势逐步被青年家庭城市化新趋势所替代。人口形势变化、技术变革、产业迭代,带来就业结构变化。这些带有一定长期性和趋势性的新变化,都为乡村青年、西部青年在本地本省就业提供了便利。当然,这或许也能够反映出数字时代深入发展带来的青年“职业—居住”空间分离对青年发展空间的建构。

实体论的青年发展型省份关注青年省域分布的实然状态,有助于我们在权力、知识、媒介所生产出的知识之外,更加客观地审视青年“用脚投票”的后果,以及由此折射出的“青和力”在不同省域的重新配置。总体看,浙江、广东、江苏等发达省份的青和力优势依然突出。浙江省在各个维度均有突出表现,全省2020年净流入人口规模和净流入率仅次于广东,在所有省份中位列第二。得益于中央治疆方略、治藏方略,新疆、西藏实现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与社会稳定、长治久安相协调。此外,青年发展相关的共青团、教育等领域对口支援新疆、西藏工作也在中央、省、市各层级展开,为新疆、西藏在青年发展领域获取教育机会、增强创新能力、拓展工作资源提供了助力,不仅实现了青年留疆留藏学习就业创业,还吸引大量内地青年来疆来藏居住工作。宁夏、贵州等过去以人口流出为主的大省,也依托西部大开发及“东产西

移”借势逆袭。海南借助自贸岛建设成为青年向往之地。我们发现,诸多主动建构青年发展型省份政策体系的省份,在不同维度的实体论层面也呈现出青年人口规模或比例的优势。这或许也反映出,随着治理现代化的推进,青年发展相关政策议程对青年人口现实问题的回应性获得了一定优化。此外,福建、安徽、湖南、辽宁、河南、湖北、山东、河北等省也在不同维度入围实体论青年发展型省份名单,反映出它们在特定维度的优势。

当然,实体论的方法也有一定局限性。一

方面,限于数据可获得性,以总体流动人口推测青年流动人口,可能忽略了不同地区流入人口和流出人口年龄结构差异性的影响。统计显示,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时,全国省外流动人口中的青年占比约为57.62%,而到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时,这一比例下降为44.99%。另一方面,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流动态势也产生了较大影响。当2022年底疫情防控措施出现较大调整之后,青年人口流动是否会发生变化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表4 实体论方法测度的青年发展型省份名单

测度指标	具体方法	省份名单
本省人口净流入指标	方法一:2020年人口净流入率(测度截面时点对青年吸引力)	广东、浙江、新疆、西藏、江苏、海南、福建、宁夏、辽宁等
	方法二:2020年人口净流入规模(测度截面时点对青年吸引力)	广东、浙江、江苏、新疆、福建、辽宁、海南、宁夏、西藏等
	方法三:2020年与2010年相比人口净流入率相比增长程度(测度对青年吸引力变化趋势)	新疆、西藏、浙江、广东、海南、湖北、宁夏、江苏、辽宁、四川、湖南等
	方法四:2020年与2010年相比人口净流入规模增长程度(测度对青年吸引力变化趋势)	广东、浙江、江苏、新疆、湖北、山东、海南、辽宁、宁夏、西藏、江西、湖南、四川等
青年常住人口占本省常住人口比例指标	方法一:2020年青年常住人口占本省常住人口比例高于全国青年总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测度人口年轻化程度)	西藏、广东、新疆、海南、宁夏、青海、云南、浙江、贵州、陕西、山西、福建等
	方法二:2020年与2010年相比青年常住人口比例负增长程度低于全国负增长程度(测度人口年轻化变化趋势)	贵州、四川、安徽、浙江、宁夏、青海、新疆、河南、西藏、云南、湖南等
本省青年常住人口占全国青年总人口比例指标	方法一:2020年青年人口占全国青年人口比例(测度青年人口绝对数比重)	广东、河南、山东、江苏、四川、河北、浙江、湖南、安徽等
	方法二:2020年青年人口占全国比重高于常住人口占全国比重(测度青年常住人口相比常住人口年轻化程度)	广东、浙江、新疆、贵州、陕西、海南、西藏、宁夏、山西、福建、青海等
	方法三:2020年与2010年两次青年人口占全国青年总人口比例相比正增长(测度青年人口绝对数比重变化趋势)	广东、浙江、贵州、四川、新疆、安徽、河南、海南、宁夏、西藏、江苏、青海等

四、结 语

基于上述主流化论、政策建构论、知识建构

论和实体论的讨论,笔者认为,青年发展型省份是指一种认同青年独特价值、尊重青年成长权益、推动青年优先发展的省域治理现代化模式和可持续发展道路。它要求通过省域治理与国家

治理、基层治理的良性持续互动,在省级政府层面构筑青年优先发展的制度体系、政策体系、工作机制、平台体系、项目体系、试验体系、技术体系、传播体系、保障体系、督导体系和评价体系。同时,积极推动青年优先发展的理念和行动进入政治议程、治理议程、基层议程、学术议程和社会议程。大力推动青年发展型城市(县域)创建,协调层级间性、领域间性、城市间性、城乡间性、群体间性、流动性和“人—事”间性等关键发展关系。营造有利于青年思想引领、发展促进和建功立业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生活环境和空间环境。实现青年优先发展体系全领域、全省域和全过程覆盖。通过这些,实现了省域青年绝对数量与相对比例增长趋势,对省外青年吸引力不断增强,青年精神成为全省各个社会群体共同的精神气象。总体来看,青年发展型省份构建既是省域治理现代化的题中之意,也是中国青年发展政策体系和实施机制完善的必然路径。过去数年乃至二十年来的实践,都展现出省域青年发展制度创新和实践探索对于整个国家青年发展战略完善的意义。本研究是对青年发展型省份的洞窥,未来应进一步加强经验

凝练和理论构建,更好发挥这一中间层级对于实现青年发展现代化领域韧性治理的积极价值和意义。

参考文献:

- [1] 黑格尔.小逻辑[M].贺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302.
- [2] 李建华,李天峰.省域治理现代化:功能定位、情景描绘和体系建构[J].行政论坛,2021(4).
- [3] 沈吟,黄宏.加快建设青年发展型省份——浙江与青年,双向奔赴[N].浙江日报,2022-07-25(1).
- [4] 范力.蓝绍敏出席全省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联席会议强调: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形成工作合力 高标准高质量推动规划实施落地见效[N].贵州日报,2021-09-26(1).
- [5] 李雅娟.贵州建设青年友好型成长型省份报告[C]//吴大华,史麒麟.青年发展蓝皮书——贵州青年发展报告(2022).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22:192-193.
- [6] 广西人民政府新闻办.解读《关于建设青年发展友好型区域的若干措施》新闻发布会(现场实录)[EB/OL].
http://www.gxzf.gov.cn/zl/xwfb/xwfbh_164244/.

(责任编辑:宋 鑫)